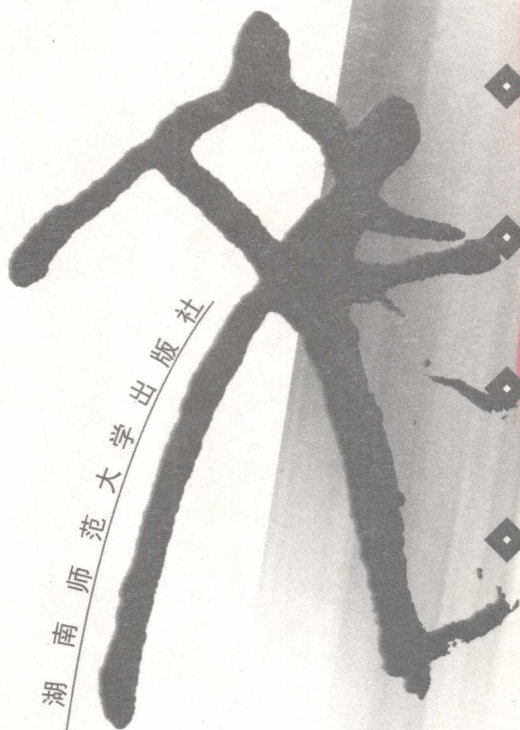


中国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研究丛书

◎谭桂林 / 著

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研究丛书

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

◎谭桂林／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I207.425
T1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谭桂林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1

ISBN 7—81081—194—0

I. 长 ... II. 谭 ... III. 长篇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5769 号

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

谭桂林 著

责任编辑: 黄瑞生 和 清

责任校对: 罗敏中 全 健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11.5 印张 259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301—2300 册

ISBN7—81081—194—0/I·009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绪论 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	(1)
一、文化母题研究的文学史依据·····	(1)
二、文化母题研究的目的与方法论意义·····	(7)
三、文化母题在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发展·····	(15)
第一章 《子夜》：都市文化的智性观照·····	(20)
一、历史价值的重新定位·····	(20)
二、都市人物的命运转换·····	(25)
三、殖民化中的精神畸变·····	(34)
四、都市品格的文学展示·····	(41)
第二章 《呼兰河传》：自我人格的生成反思·····	(48)
一、神秘与狂喜的高峰体验·····	(48)
二、热闹与躁动的童年寂寞·····	(54)
三、混沌一片中的独醒情怀·····	(60)
四、隔代沟通与物人感应·····	(66)
第三章 《白鹿原》：家与国的时代分流·····	(72)
一、家族小说叙事模式的历史演变·····	(72)
二、家与国的权力抗衡与分化·····	(77)
三、权力置换中的文化隐喻·····	(82)
第四章 《马桥词典》：启蒙主题的双声对话·····	(86)
一、文明批判与人性寻根的互织·····	(86)

二、启蒙话语与马桥话语的碰撞	(94)
三、祛魅与含魅的叙事逆向	(101)
第五章 《心灵史》：宗教情怀的归依与融入	(109)
一、由文化寻根到血缘寻根	(109)
二、文化比较中的宗教取向	(114)
三、宗教文化与小说叙事	(121)
第六章 《九月寓言》：土地之根的世纪寻索	(128)
一、生命的根植于土地	(128)
二、无根基时代的土地焦虑	(134)
三、言说方式与历史理性	(140)
第七章 《黄泥街》：人类退化的警世寓言	(147)
一、“黄泥街的问题是个谜”	(147)
二、两种生态的讽喻性对照	(152)
三、人类精神的超前警示	(159)
第八章 《废都》：男权文化中的性爱叙事	(166)
一、性与政治的游戏文本	(166)
二、文人性意识的原型复现	(176)
三、性爱叙事话语的悖离与分流	(183)
第九章 《施洗的河》：生命的原罪与救赎	(188)
一、没有归路的堕落深渊？	(188)
二、原罪与神性的对话	(195)
三、地狱边沿上的恐惧	(201)
第十章 《丰乳肥臀》：生殖崇拜与狂欢叙事	(208)
一、民族苦难中的生殖崇拜	(208)
二、生殖崇拜的精神异化	(214)
三、酒神精神与狂欢叙事	(220)
第十一章 《私人生活》：成长母题的女性书写	(226)

一、弑父与恋父的交战	(226)
二、自恋与他恋的转化	(233)
三、成长中的残缺性	(240)
第十二章 《在细雨中呼喊》：童年心灵的回声	(246)
一、生命与死亡的临界处	(246)
二、人性之恶与温情呼唤	(254)
三、过去与现在的时空联接	(263)
第十三章 《尘埃落定》：历史宿命中的“傻子”造型	(270)
一、历史衰颓中的灵性变异	(270)
二、艺术造型中的藏汉文化交融	(276)
三、“傻子”造型的艺术渊源与原创性	(282)
第十四章 《长恨歌》：都市文化的民间演绎	(287)
一、人物命运的个体言说	(287)
二、怀旧情结中的生态焦虑	(296)
三、都市风景的女性涂抹	(302)
附录：中国现代童年母题文学综论	(307)
后记	(362)

绪论 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

一、文化母题研究的文学史依据

无论在西方文学中还是在我国古代文学中，长篇小说的兴起与发展总是与民族的历史紧密联系着的。在西方，长篇小说是从民族史诗演变而来；在中国，长篇小说也是最早滥觞于演述民族历史的说书。所以，如果说诗歌往往被冠之以艺术之王的美誉，那么长篇小说则通常被称之为民族的史诗。从艺术的功利目的来看，这是一个崇高的荣誉，也是读者对长篇小说的一种阅读期待。人们都希望在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中，不仅读到一个曲折离奇的故

事，看到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读到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而且看到一幅细腻逼真、蕴涵深厚的民族生活风俗图画。这是传统的审美观念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最高要求。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曾从作家的角度对这一要求作了很形象的表述：做社会的秘书。当然，做好社会的秘书，不仅在于记录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段历史的风俗人情，而且也可以说最主要的应是把握住民族在某个时代、某段历史中的精神心理活动与演变的历史。所以，勃兰兑斯说，一部文学史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风俗人情史是民族的外在的生存方式，而心灵史则是民族的内在的生存方式，因而，长篇小说对民族生存方式的把握是一种总体的把握。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它们篇幅的长短、容量的大小，而在于它们把握民族生活的方式的不同。中短篇小说的把握方式是侧面的、断片的，长篇小说的把握方式才是总体的、联系的。这种区别也就决定了研究者在进入这两种体式的文学时将自觉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角度。

从母题的角度切入长篇小说的研究，这是 19 世纪以来文化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发展的一种成果，也是当代长篇小说研究吸取最新人文科学技术成果来丰富与发展自己的一种尝试。这种研究无疑是有着很深刻的理论意义的。母题作为一个音乐美学的概念，是指一部组曲中不断地反复地出现的一个旋律。这个概念后来被引进到文化人类学与比较诗学之中，并被十分广泛地使用开来。在比较诗学中，文学母题与某一特定作品的主题之间的区别在于：主题本身体现的只是一个思维过程，是作家通过一连串的事件、意象等构成的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阐释；而母题则是一种基本的人类概

念、精神现象或动作本身，如乡土、都市、生命、死亡、战争、复仇、漂泊、童年、成长、家族、性爱等等。在文学创作中，母题的存在往往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是重复性，人类的精神与心理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而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繁复，越来越精致，但有些基本的特质是不会改变的，它们像一根生命的红线，紧紧地维系着人类作为一个文化族群在大自然中的独特存在。所以，歌德曾经说过：母题是一种“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① 这就是说母题乃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任何一种时代里它们都有可能出现。其次是整体性，每一种母题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体现，无疑是一种具有独立自足性的精神现象，它有其自己独特的结构功能与叙事模式，各种相近的题材与主题之所以能被纳入到一个母题之中，就是因为这些题材或主题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意义联系，在外在的形式上也存在明显的共同点。再次是变体性，有母题则必有子题，这些子题往往就是母题的种种变体。母题作为某种人类基本概念、某种精神现象，当它局限于自身时，它存在于抽象或原生状态中，只有当它以各种变体类型具现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时，它才获得生命的有机性与整体性，并且真正显示出自身在外延上的广阔性与表现上的丰富性。所以，理解文学史上某种母题现象必须沉潜于该母题的各种变体中去寻找这一母题系统赖以存在与更生的内在机制。正是由于这些特性，母题本身具有十分广阔的理论空间，可以运用文化学、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叙事学、比较文学与比较宗教学等多

^① 转引自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种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考察研究。对文学母题的研究体现着当代人文科学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打破学科界限、贯通古今中外的一块新的理论处女地。

较之其他种类的文学体式,长篇小说无疑是最适合于进行母题研究的。但是由于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产品丰富,汗牛充栋,阅读量大,评论界对长篇小说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单部作品的分析,研究者关注最为密切、操作起来也最为得心应手的依然是作品的人物形象、形式技巧、思潮影响等问题。这种现象对于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批评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其实,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从20年代开始到30年代成熟,经过八十年的发展,各种母题的创作都已经粗具规模,有些母题的小说不乏精品与经典作品。如家族母题中的《激流》三部曲、《财主底儿女们》、《憩园》、《无望村的馆主》、《四世同堂》、《三家巷》、《白鹿原》等,童年母题中的《呼兰河传》、《幼年》、《在细雨中呼喊》等,乡土母题中的《生死场》、《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山乡巨变》、《芙蓉镇》、《梦土》、《九月寓言》等,都市母题中的《子夜》、《骆驼祥子》、《钟鼓楼》、《都市风流》、《上海宝贝》等,荒诞母题中的《围城》、《黄泥街》、《死街》、《突围表演》等,漂泊母题中的《江湖行》、《海艳》、《呼吸明天》等,宗教母题中的《心灵史》、《无性别的神》、《施洗的河》、《务虚笔记》等,性爱母题中的《废都》、《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等,生命母题中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等。以上只不过是一个十分简约的列举,但从这个简约的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在近百年的中国新文学中,具有比较丰厚的文化底蕴、能够纳入到文学母题范畴中来研究的长篇作品其数量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增多的,尤其是到了80年代以后长篇小说对文化

母题的揭示越加显示出自觉性与深刻性。

这是必然的。一方面，文学创作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每一种母题作为人类精神现象，文学对它的揭示与表现都既有继承性又有开创性。从继承性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中爱情、军旅、复仇、悲秋、伤别等等母题的创作是十分发达的，为后世文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与艺术资源。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写家族兴衰就很明显地继承了《红楼梦》的艺术手法与某些思想观念，包括家族人物类型的设置、青年男女爱情的描写、家族内部互相倾轧的揭示以及家族命运的衰败寓言。张爱玲本来就是一个“红迷”，她的家族小说中的苍凉基调、女性心理刻画的精微细腻、小说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语言的惟妙惟肖，都深得《红楼梦》的神韵。从开创性来看，由于文化发展自身的局限，有些文学母题在汉民族的文学历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阙如状态，最突出的如童年母题。中国家族伦理中的老者本位观念、传统文化中的望子成龙心态以及道学传统培养出来的士大夫的方巾气等等，共同封杀了中国文学观照童年生活的兴趣。周作人是最早意识到并慨叹中国文学中的童年母题缺乏的新文学作家。在五四时代里他曾由于“往见外国二三歌咏儿童的文学之总集，心甚喜爱，惜中国无此类书物，欲自行编辑则无此时光与力量”，因而从《西青散记》、《浮生六记》等古代书籍中抄录了一些回忆童稚孩提时代生活趣事的诗歌以飨读者，并且感慨系之地说：“这些诗歌记述儿童生活都颇有意思，如在歌咏儿童的文学比较发达的地方，这样的东西原算不得什么，但是在我国就不能不说是难得而可贵了”^①。直到

^① 周作人：《秉烛后谈·儿时杂事》。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都从中西文明发展的比较中明敏地觉察到了我们民族国民精神的弱化衰老以及生命力的萎靡不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咎于传统文化的老者本位思想，于是，西方文化中的幼者本位口号被响亮地提出，而现代作家对于自我童年生活进行艺术性的返观的兴趣则被幼者本位的时代思潮大大地激活，中国现代童年母题文学也就在这样一种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突如其来地诞生了。最早是鲁迅的短篇小说《社戏》显露出这一母题叙事的某些基本特征，到萧红《呼兰河传》面世时，中国现代童年母题文学的创作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准。在中国文学与文化母题的关系上，现代童年母题的出现无疑是一种开创性的成果。

开创性不仅表现在对文学历史的缺憾的弥补，而且也表现在对文学史上一些传统母题的意义的深化与模式的重构。譬如漂泊，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表述得最为充分与生动的一个文学母题。从屈原的“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到苏曼殊的“芒鞋破钵无人识”、“绝岛飘流一病身”，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无不喜好写羁旅之情，填倦客之词。但是古代之漂泊母题往往出现在流寓文学和迁徙文学之中，其原因无非士大夫或因直言犯上，或因怀才不遇，被皇上远远地发配到边陲与蛮荒之地。所以古代之漂泊是一种被动的漂泊，肉体的漂泊，“狐死必首丘”，“螭蛄顾而不行”，漂泊者不仅深深地保留着对故乡的依恋，而且非常清晰地表露出一种回归意识与还乡情结。比较而言，现代文学中的漂泊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漂泊、文化漂泊。或者出之于对旧有文化传统的背弃，或者出之于对周边人文环境的黑暗的恐惧，或者出之于对心灵中一种神秘指令的倾听，漂泊者都主动地从安居与享

受中放逐了自己。鲁迅的“行者”不管前面是坟，还是花园，他都义无反顾地将自己永远地投入到前途的暮色中。《海艳》中的印蒂在获得爱情的巅峰体验之时，忽然感觉到了一种深刻的空虚。他的肉体依然“和她同凝聚爱，共制造欢乐，灵魂却孤独升上二万尺高空，以冰冷的眼睛来看这肉体的机械的重复”，于是他知道是该漂泊的时候了。“假如他再留下去，他所能做的，只是千万次嚼蜡的重复，并且还要重复厌倦，重复失望。”《财主底儿女们》中的孙松鹤甚至觉得“在这个悲惨、险恶、荒凉的世界里，冀求幸福，是可耻的”，“贪图安宁、温暖、甜蜜，是卑劣的。他觉得，他必须追随着他底不幸的朋友，永远在这个险恶的地面上漂流”。这些漂泊者在其性格特质上无不显示出不求归宿、无意回家、永动不止的文化精神，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文学中的漂泊母题与古代文学中的漂泊母题在精神品性上的最为根本的区别。当然，由于古代文学中的漂泊母题主要是以诗歌的文学体式来表现的，受到文学体式本身的限制，因而古代漂泊母题大都注重精神、意象、情感的表达，而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则进入到了小说等叙事文学中，因而对漂泊母题的表现已经比较重视漂泊的生命过程的叙述，从而使中国文学中的漂泊母题在生命表达的品格上同西方文学获得了一致性。

二、文化母题研究的目的与方法论意义

对长篇小说中的文化母题的研究在目的与方法论上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评析，也不是文学历史的描述，更不是一般性的文化意蕴的归纳。我认为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母题的研究，其是否深入与成功大致可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应该通过文化母题的研究来揭示出民族文

化的某些意象原型。原型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在荣格那里被定义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表象。集体无意识是原型的内容，而能够表现这些集体无意识内容的某些特定的意象就是原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原型乃是一些没有经过意识加工的心理内容，还是心理经验的直接材料，在原型与经过演变的历史公式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原型可以说是表达某种心理内容与精神活动的基本意象，虽然“当它逐渐成为意识及可以察觉时便发生改变，并且从其出现的个体意识中获得色彩”，^① 但其所表达的心理内容尤其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各种不同的变体中仍是相通的。文化母题出现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原型的存在，而原型也就成了维系同一个母题中的诸多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形式因素。现代文学的历史时空是很短暂与狭窄的，但现代文学所面临的文化问题却比任何一个百年的时段都要复杂。在这样一个拥挤的文学时代里，作家的文化意识越是强烈，作家的心理内涵越是复杂，文学作品中的原型意象就越是突出。考察一下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小说即可看到，几乎每一种母题的出现都伴随有一些原型意象，它们非常贴切而深刻地体现着这一母题创作所达到的历史深度与内涵的厚度。家族母题作为现代启蒙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作为反封建礼教与宗法制度的现代理念的一种形象表达，其原型意象的构建明显应和着主题表达的要求。这里可略举几例：如“老屋意象”，每一个旧式的大家庭都有一栋年代久远、锈迹斑斑的老屋，这栋老屋既是大家庭成员活动的空间，也是大家庭中礼教吃人的历史见证，而在大家庭衰落之时则是大家庭成员维系家

① 《荣格文集》，冯川编，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族情感与血缘关系的惟一的纽带。每一栋老屋的深深庭院中都隐藏着令人发怵的秘密，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每一栋老屋最后都只剩下几个满脸沧桑的老人在大而无当的院子里翻晒着陈旧发霉的故事。《家》的高公馆、《憩园》中的憩园、《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家大院就都是这样的老屋，显示着宗法家族制度的历史的滞重与森冷。又如“废园意象”，许钦文的小说《父亲的花园》在现代文学中首先勾勒出“废园”的轮廓，奠定“废园”的基本的情感特征。昔日繁华的“父亲的花园”只是记忆中的花园了，而现在的花园已经不见了昔日欢声笑语的姐妹，也不见了过去的花团锦簇。在《财主底儿女们》中，蒋家的儿女们几乎每个人都与后花园有过一段特殊的情感联系，每一个人都在后花园中隐藏着自己的一个心灵的秘密，甚至蒋家的主人蒋捷三老人在后花园中也有一块只属于自己的领地，这就是被松树林子包围着的那块荒芜的草地。蒋捷三经常独自站在松树林中凝望着这块荒地，一片恐惧从心灵的深渊处油然升起，因为在这块荒地中蒋捷三看到了自己家族命运的预示。事实上，在现代家族小说中的废园意象大都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以自己的今不如昔的面貌、以自己颓废的情调象征着封建大家族的必然崩溃。

如果说像家族、乡土等母题创作在意象的创构上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意象，那么在现代文学创作中的都市母题的意象原型则与现代都市发展的时代特征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乡村与城市事实上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仅是指城里人往往依靠乡里的地租生活，而且是指在古代城的概念只是用来作为军事的防御，在文化的同一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并没有很明显的区别。但是 20 世纪初叶中国都市的崛起完全是在西方军事、经济、

文化的输入与挤压中形成的，都市与农村之间的密切联系被都市的无限的膨胀所斩断，现代都市中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大量地来自于西方的舶来品，农村在迅速衰落凋敝，而都市的繁荣则伴随着无可救药的畸形与病症。这样，在现代都市母题文学的创作中，无论是如沈从文等站在乡土立场来批判都市文明的，是如茅盾等处于中性立场来理性地解剖都市文化的，还是如刘呐鸥等对现代都市文明持一种赞赏态度的，都不约而同地注重揭示现代都市的“都市病”意象。如摩天楼意象，这是现代都市的一个典型的物质外观形象，写现代都市生活不可能不去描绘那比肩林立、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但在这个意象中潜藏的却是现代人远离大地的无形的焦虑。因为都市人整天生活在摩天楼里，双脚离开了大地之根，生命不由得处于一种悬浮状态，生命力也就萎靡不振，因而都市人无不神经过敏、歇斯底里。又如会馆意象，都市中的芸芸众生大都是来自于乡村的朝拜者与淘金者，他们不仅远离了大地，而且也远离了自己的家园。在都市中，他们是没有家的人，因而将自己的生命大都耗费在夜总会、咖啡馆、旅馆、跑马场等都市的公共性场所。正是在这些会馆意象中，都市生存的忙忙碌碌与意义缺席这相互悖反的两重性得到了深刻的揭示。再如邂逅意象，在熙熙攘攘的现代都市中，人的生命就好像大海中的一朵泡沫，存在是无声无息，消失也是无声无息。偶然在人的命运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邂逅则是都市人经常能够体验到的一种激情遭遇。有时是相熟者的邂逅，它给邂逅者带来难以言说的酸辛，有时是邂逅之后的各自消失，它给邂逅者留下的却是不能抹去的怅惘。邂逅意象就是这样揭示着都市人生的怪异与变幻的本性，并且成为都市母题写作的一个标志性的特点。这些意象

在茅盾、楼适夷等左翼作家以及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的都市母题小说中都有精彩的描写。

由于原型乃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象征，因而对母题中的意象原型的寻找、归纳与分析，不仅仅是对一些具有独特性的形象的艺术把握，实际上也是对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揭示。关于原型在民族生活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荣格曾经有过这样的分析，他说：“生活中有多少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刻进了我们的精神构造中，它们在我们的精神中并不是以充满着意义的形式出现的，而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形式’，仅仅代表着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动的可能性。当符合某种特定原型的情景出现时，那个原型就复活过来，产生出一种强制性，并像一种本能驱力一样，与一切理性与意志相对抗。”^①由此可见，荣格虽然在心理学上并没有把原型当作本能的显示，但他把原型与理性的对抗看得如此重要，说明原型与本能在其功能的发挥上具有相似性。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民族精神特质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本能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的控制，一方面则是来自于理性意义上的思维定势的限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以现代理性反抗与批判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传统，是这个思想启蒙运动的首要任务。但封建文化传统本身是标榜“理性”的，许许多多扼杀人性的礼教制度就是披着天理的外衣而行的，甚至在人们的思维习惯中，许多违背人性的礼教制度竟被人们认同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受害深重而茫然不觉。因而破除在封建“理性”的长期浸淫下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无疑是新文化运动不可回避的重

^① 《荣格文集》，冯川编，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